

社會轉型和政治文化

徐友漁

任何人都會承認，中國社會在近20來年發生了巨大變化，但這是社會轉型而非政治轉型。同樣，中國知識界的思想狀況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和深刻分化。改革、開放剛啟動時，人們的立場、情緒可以用「咸與維新」來形容；而現在，任何稍具批判精神的知識份子都不會毫無保留地肯定現狀，人們重新深刻地思考改革的目標，思考社會轉型的含義和後果。

我認為，中國的社會轉型發展到今天令人不滿的地步，知識界不能負主要責任，甚至沒有多少責任，因為知識份子在這個過程中並沒有起主導作用。但另一方面，知識份子對中國社會變遷是否有清醒的認識，是否為營造一種恰當的政治文化盡到了責任，對此問題是應當反省和檢討的。

中國的社會轉型發展到今天令人不滿的地步，知識界不能負主要責任，甚至沒有多少責任，因為知識份子在這個過程中並沒有起主導作用。但另一方面，知識份子對中國社會變遷是否有清醒的認識，是否為營造一種恰當的政治文化盡到了責任，對此問題是應當反省和檢討的。

一 政治文化缺課的改革

中國的社會發展水平比前蘇聯低，改革的意願和動力大不如蘇聯，當赫魯曉夫 (Nikita Krushchev) 邁出改弦更張的第一步時，中共作出了猛烈反應，但在70年代末，中國改革的決心之大，步伐之快，不但令世界矚目，還令世界吃驚。這是為甚麼？這是因為，中國有一個文化大革命。中國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摧毀毛派政治集團「四人幫」的中共領導人，認識到原先的路走不通了。中國以一場浩劫為代價，得到一個告別毛澤東主義、告別毛式社會主義的機會。但中國並沒有把握住這個契機，或者說，中國有志之士抓住這個契機的努力沒有成功。中國在文革劫難中付出的代價之大和之後收穫之少，恰成鮮明對比。

可以和德國(這裏指西部)經歷了法西斯統治這場浩劫後發生的巨變作一對比。德國戰敗後，大量的獸行與慘劇被揭露，一方面德國人痛定思痛，另一方

面卻對西方戰勝國強加的憲政民主體制隔膜甚至反感。德國如果要新生，就需要一種全新的政治文化。形成一種新的政治文化殊為不易，戰勝國的軍事佔領是必不可少的條件之一，德國知識界的歷史感和深刻性也是重要因素。德國知識界為營造新政治文化一直艱苦努力，從阿倫特 (Hannah Arendt) 到哈貝馬斯 (Jürgen Habermas)，他們始終堅持徹底批判法西斯主義、深刻揭露其根源的政治生活，終於使得反法西斯、反種族主義、維護人權與和平成為全民族的共同準則。

中國經歷浩劫之後這兩個條件都沒有，既沒有外力強制，中國知識界的自覺程度和主觀努力也不夠。就新的政治文化建設而言，中國思想界在70年代末面臨着一個極為艱巨的歷史任務，這就是：徹底清算毛澤東主義，揭露文化大革命的法西斯專制性質，探討文革得以發生和釀成大禍的制度性原因；清算「鎮反」、「反胡風反革命集團」、「反右」等各項政治運動反人性的本質和對全民族的傷害；清算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危害，總結其教訓。在批判、揭露、探索的基礎上，應該形成一種嶄新的政治文化，使得曾經遭到極度否定的人的價值和權利——信仰和思想的權利、言論表達的權利、個人安全和尊嚴的權利、結社的權利、擁有財產的權利，等等——成為中國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基石。在這種政治文化的熏陶下，中國人將知道自己的權利和服從法律的義務，將對任何專斷的傾向、侵犯人民權利和削弱法律權威的傾向警惕和鬥爭。但是，這種政治文化並未形成。

從另一個角度看，即從當權者的立場看，中國的改革大致是成功的。改革20來年，中國經濟有舉世矚目的增長。雖然貧富差距極大增加，下崗工人的示威請願不斷發生，但政府有力量彈壓。更重要的是，幹部隊伍和其他各行業中的一些人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團。應當承認，現在中國社會上有抱負、有能力的人中，願意擠進統治階層和願意用不正當或正當手段發財致富的人，遠遠多於願意為社會正義努力的人。如果社會上最有能量的人多數肯定現狀和安於現狀，並有條件發揮他們的能量，那麼這個一黨執政的體制是安全的。20來年轉型和變遷的最大特徵，是統治的維持不是靠意識形態而是靠既得利益，是革命黨正在轉變為執政黨。統治者喪失了道義優勢和士氣，但統治機器憑藉巨大的慣性仍能運轉。

中國的改革是由中共領導層中較有遠見的少數人發動和主導的，改革固然有利國利民的一面，但改革的根本目標與其說是救國救民，不如說是救黨。這個目的在國家意識形態中的表達是「一切要有利於安定團結」，即政治上不要有變動，一黨執政的局面決不要變。顯然，改革20年一手鬆 (經濟)、一手緊 (政治) 的局面始終未曾改變。80年代中國新政治文化的建設有其曲折的道路，我將在下一節分析。但1989年後，中國一直處於一種「改革的停滯」或「停滯的改革」狀態，權貴式改革的成功和當權者扼殺、壓制中國新政治文化的成功完全一致。所以，到二十一世紀剛剛開始的今天，中國的新政治文化建設仍然是一個需要大力啟動的時代課題。

中國改革的根本目標與其說是救國救民，不如說是救黨。改革的出發點和歸宿都是要有利於黨執掌政權。20來年轉型和變遷的最大特徵，是統治的維持不是靠意識形態而是靠既得利益，是革命黨正在轉變為執政黨。1989年後，中國一直處於一種「改革的停滯」狀態，權貴式改革的成功和當權者扼殺、壓制中國新政治文化的成功完全一致。

二 新的政治文化為甚麼沒有形成？

在上一個世紀的70年代末，中國似乎很有希望產生新的政治文化，因為文化大革命的災難使人們認識到了毛主義和毛式社會主義的徹底破產。不但激進的毛派份子「四人幫」被打倒，溫和的毛派、文革的既得利益者也逐漸失勢，一種新的、以反專制為基調的政治文化氛圍開始形成。掌權者全是在文革中受過毛的迫害或打擊的人，他們不想再有文化大革命，也打算總結經驗教訓。

1979年，希望達到最高點，對毛的揭露、批判不斷升溫；張志新事件被披露，標題為〈誰之罪？〉的文章開始從制度層面追究和分析。「西單民主牆」不但得到容許，而且得到讚揚。「西單民主牆」運動中湧現了一批很有實力的民間思想家，其中《沃土》的主筆從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政治哲學談起，剖析專制主義產生的思想根源，後來又寫出了膾炙人口的〈論言論自由〉。這些人曾尋求過當時在體制內有一定地位、在社會上有相當號召力的知識界領銜人物的支持，但這些大人物未予重視，他們顯然不理解新出土的思想幼芽的意義，僅熱衷於自己「為馬克思主義正本清源」或「為民請命」的工作。

在京召開的「理論務虛會」勢頭很好，體制內的理論精英濟濟一堂，對毛主義的批判越發深入、暢所欲言。但就在這關鍵時刻，思想解放過程戛然而止，「四項基本原則」定於一尊，一切思考和探討的道路都被封死。這表現了「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政治智慧」，因為他們本質上是毛主義者，他們可以批判毛的某些路線、方針，但決不容許批判毛的政治原則，毛締造的政治制度。《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出爐，成為政治理論問題的標準答案。它固然是各方意見妥協的產物，也包含了一些批毛的內容，但它的本質是維護廣義的毛主義，阻止對政治制度及其原理的思考和批判。

70年代末期體制內形成新的政治文化的努力受挫，並一直受到箝制和打壓，這種努力就由體制外的學者在社會上繼續，這是理解80年代「文化熱」的鑰匙。80年代的「文化熱」有雙重含義：一，它有不得已而為之的性質，政治訴求轉向文化，它不再具有塑造新型政治文化的直接性；二，在泛化和淡化的同時，它的政治訴求具有深化的優點。體制內理論家雖然有道德勇氣，但他們的眼界相當狹隘，知識結構功底在馬克思主義方面。中國要形成新的政治文化，需要從頭做起，需要恢復中斷了幾十年的學統，需要在近代經典學理和當代新興思潮兩方面補課。

既然不可能正常地塑造一種新的政治文化，那麼我們現在就不應該責備80年代知識界失職。但這並不妨礙我們今天對當時思潮的疏理和檢討，以利於將來的發展。

在80年代中前期，按體制內思路活動轉到體制外繼續從事啟蒙的人，高揚人性和人道主義的大旗，大談異化，其中學養最深的人已經從政治文化的角度反思和批判黑格爾哲學，主張「寧要康德，不要黑格爾」。這是因為他們難能可貴地看到了康德哲學中政治自由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而黑格爾思想中的專制因素頗為豐富。但是，他們在德國古典思辯哲學中停留得太久了，為掙脫

70年代末期體制內形成新的政治文化的努力受挫，這種努力就由體制外的學者在社會上繼續，這是理解80年代「文化熱」的鑰匙。「文化熱」的思想學術成就巨大，但其對精神和文化的偏愛大大超過對制度安排的探索；追求深刻性、基礎性、系統性，而對現實性、直接性較少焦慮。其結果是，當社會風潮突起之時措手不及。

傳統思想而付出的時間和精力太多了，如果他們熟悉西方哲學在二十世紀的內容，本可以更快地越過這一階段的。

有更多的思想派別、學術集團、文化山頭並不囿於馬克思主義和德國哲學的背景，他們有的大力吸收當代自然科學的最新成果，力圖在世界觀、歷史觀方面有所突破和建樹（這種努力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歷史唯物主義是舊政治文化的核心）；有的全面、系統引介二十世紀西方人文思潮，目的是為重新理解外部世界，尤其是當代世界，從而為深刻理解中國提供參照和學養；有的突破中國人對「文史哲」的傳統偏好，引進人們不熟悉的，但對營造新的政治文化極為必需的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方面的知識；即使是以恢復對中國傳統思想的正常研究為己任的學人，也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具有為營造新政治文化打基礎的意向。這種種工作的意義在90年代開始顯示出來。

對這些體制外的迂迴努力和基礎性，我想僅從新政治文化建設的角度簡單評論幾句。「文化熱」的思想學術成就巨大，但似乎在形而上的維度上着力過多，對精神和文化的偏愛大大超過對制度安排的探索；人們追求深刻性、基礎性、系統性，而對現實性、直接性較少焦慮。有人曾說過，中國人熱衷於「形而上」和「形而下」，就是對「形而中」不感興趣，80年代的顯學是美學，宗教倫理學也大行其道，似乎在重走心性之學、「先內聖然後外王」、「改造國民性」的老路。其結果是，當社會風潮突起之時措手不及。

當然，不能以政治文化為唯一尺度，大多數學者並不以此為己任，他們在自己喜愛的領域工作並獲得成就與影響，決不能說他們領導潮流不力。但改革風潮中思想文化界某些最有影響的人素養不夠，未能盡到自己推動新政治文化產生的責任，卻也是不爭之事實。

三 六四事件：政治文化建設的中斷

在80年代，形成新政治文化的工作在風風雨雨、磕磕絆絆中迂迴曲折地進行，但1989年發生的六四事件使這種平穩、漸進的文化建設工作戛然而止。六四之後有一段空白期，其間知識界瀰漫着犬儒主義和拜金主義，然後，後現代思潮和新左派思潮的出現，使中國知識界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整體性地致力於反專制主義的政治文化建設了。

1989年事件有一個總的歷史文化背景，不少知識份子在年初甚至年前就有一種預感甚至預言：1989年一定會發生甚麼事情，因為這一年恰恰是五四運動70周年，法國大革命200周年。這兩個日子的寓意再明顯不過了：以啟蒙思想為先導，反對專制，爭取自由和民主。1989年初，著名的知識份子，不論是科學家、人文學者、作家，還是各界知名人士，單獨地或分批地上書最高領導、發表公開信，呼籲釋放政治犯、保障人權。幾批知識份子不約而同、言簡意賅地提出一個要求：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

不少知識份子在1989年初甚至之前就有預感：1989年一定會發生甚麼事情，因為這一年恰恰是五四運動70周年，法國大革命200周年。年初，著名的知識份子紛紛上書最高領導，發表公開信，呼籲釋放政治犯、保障人權，強調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1989年發生的六四事件使這種平穩、漸進的文化建設工作戛然而止。

六四事件是分水嶺，因此，對它的起因、性質、後果進行反思和分析是必要的。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引發青年學生的民主抗議運動的導火線是胡耀邦逝世這一偶發事件。胡耀邦是因為主張寬鬆和寬容，反對搞「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鎮壓學生而下台的。無論是數以萬計的學生，還是引人注目的大批新聞工作者在天安門廣場的和平遊行請願，其思想後援則大都是來自十來年持續不斷的反專制政治文化的影響。

從鎮壓力量的思路和鎮壓過程的演變加劇看，更能說明中國政治文化的癥結究竟在何處。1989年的事件之所以釀成震驚世界的慘案，關節點在於《人民日報》的「4.26社論」，如果沒有這個令學生讓無可讓的「定性」，1989年的學生運動的結局將和80年代的前幾次學潮一樣，決不會成為震驚世界的事件，成為蘇聯東歐巨變的先導。30年（甚至更長）的歷史經驗表明，掌權者的政治思維是一種容不得半點不同意見的家長觀，是只知道「你死我活」，決無妥協餘地的鬥爭哲學。他們過份敏感、誇大「敵情」，有一點動靜就認為一場「有預謀、有組織」（往往還「有黑手」、「有國外背景」）的、以奪取政權為目的的鬥爭正在來臨。事實上，甚至在掌權者當中也有人對這種過時的、荒唐的政治思維不以為然，可惜未能佔據主流。中共的革命新傳統的政治文化是如此根深柢固，在經濟體制正在發生變化的時候，它毫無改變，致使六四悲劇發生。

1989年的事件之所以釀成震驚世界的慘案，關節點在於《人民日報》的「4.26社論」，如果沒有這個令學生讓無可讓的「定性」，如果當局能在這一點上有所鬆動，當年的學生運動的結局將和80年代的前幾次學潮一樣，決不會成為震驚世界的事件，成為蘇聯東歐巨變的先導。掌權者的政治思維是一種容不得半點不同意見的家長觀，只知道「你死我活」的鬥爭哲學。

六四事件發生不過十餘年，最近有人對六四提出了另一種全新的解釋。按這種解釋，「這一運動的許多訴求與1999年11-12月間在西雅圖、2000年4-5月間在華盛頓發生的對於WTO和IMF的抗議具有內在的聯繫」^①；「1989年社會動員起源於社會各階層對於放權讓利的不平等過程的抗議，起源於地方和部門利益集團對於中央政府的調整政策的不滿，起源於國家內部的分化，還起源於社會各階層與國家機器之間的互動關係。」^②「參與1989年社會運動的階層也包括了一些利益群體，他們在1980年代以放權讓利為特徵的改革過程中得到了廣泛的好處，出於對正在到來的調整政策的不滿，這些利益群體試圖通過將自己的訴求注入社會運動，推動國家進行更為激進的私有化改革。」^③

對以上論述，我不是不屑於論爭，但我真不知道如何論爭。我驚訝於作者捏合事實、套裁現實的勇氣。好在短短的十餘年，幾乎所有的捲入者、觀察者都還健在，當事人的回憶大量出版，有關文件、材料，包括官方機密材料也已出版，它的起因、過程一清二楚，對其性質不難判斷，海內外對之形成了基本的共識和判斷。

六四事件使新政治文化的建設中斷。六四鎮壓之後，不出預料地出現了對新政治文化的反動氣氛，其基調是「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全盤西化」、「反和平演變」，這又從反面證明了六四的起因和性質。在這種反動的氣氛中，官方試圖徹底清算80年代的非官方文化建設活動，批《河殤》就是顯著的一例。到了90年代中期，出現了性質同樣為左，但話語十分時髦的另一種清算，比如有後現代派人士說，80年代的新政治文化建設是「在『啟蒙』話語中沉湎的知識份子對西方話語無條件的『臣屬』位置和對於『現代性』的狂熱迷戀」^④。又如，還有的新左

派對80年代的文化活動全面清理，他們除了與己相同的少數幾個人外，對各家各派都輕率地加以否定^⑥。應該承認，新左派的清算往往較老左派有力 and 有效。

四 90年代以來政治文化的不同路向

六四事件使中國政治文化建設中本來就無可迴避的問題更加尖銳：我們面對着專制和暴力。我們需要探究：它的形成原因，它在新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表現形式，取代它的政治制度形式、社會條件和實現這種取代的可能性與方式。但作為思想界一般性的、前提性的任務，仍然是對專制政治的批判。90年代中國知識界的分化和基本分野，說到底就是堅持這個方向，繼續努力完成五四運動就提出而一直沒有完成的任務，還是背離、偏離這個方向，抵制和詆毀完成這個歷史任務的努力（過去的和正在進行的）。90年代至今，中國思想文化場景紛繁複雜，但從這個角度看，基本輪廓和分野還是清楚而簡單的。

以下僅以90年代三次討論和爭論為例加以說明。

(甲) 關於激進主義的爭論

對激進主義的反思這個論題是余英時在1988年提出的，與六四運動無關，而與批判舊政治文化密切相關。余先生的論題可以這麼理解：中國革命政權的建立以及中國革命的發生是一場悲劇，中國知識份子對此應負責任，問題出在他們的激進心態。這種看法對於大陸知識界來說是相當新穎而具啟發性，當然，它引起的爭議和批評不下於贊成與響應。

在錯綜複雜的學理交鋒和論證之中，有三種觀點與本文討論有關。

第一，朱學勤不同意余英時的觀點，認為它對中國革命原因的解釋是一種文化決定論，與其說是知識份子的過激心態釀成革命，不如說是一系列事件（包括像西安事變這樣的偶然事件）導致本來無望的革命居然成功。

第二，李澤厚接過反思激進主義的思路，提出「告別革命」的口號。如果說余英時反激進的目的是清理既往，那麼李澤厚則剛好相反，是為了維護現狀。李在學理上有一種內在的困難：一個激進的革命政黨用過激的手段取得政權，靠反激進論去維護它，同時也就是剝奪它的歷史合法性。

第三，汪暉出於反自由主義的目的，提出一種有關中國激進主義的論說，其錯誤一望而知。首先，他斷言反思激進主義是出於總結1989年的運動，而形成的共識是對激進主義的批評^⑦，這兩點都不是事實；其次，他將自由主義等同於反激進主義^⑧，這也不符合事實。自由主義和反思法國大革命中的激進民主主義有關，但和解釋中國革命的起源與成功沒有內在聯繫。實際上，與余英時論爭、反對李澤厚觀點的，好多都是自由派學者，汪暉並沒有弄明白這一點。

六四事件使中國政治文化建設中本來就無可迴避的問題更加尖銳：我們面對着專制和暴力。作為思想界一般性的、前提性的任務，仍然是對專制政治的批判。90年代中國知識界的分化和基本分野，說到底就是堅持這個方向，繼續努力完成五四運動就提出而一直沒有完成的任務，還是背離、偏離這個方向。

(乙) 關於人文精神失落的討論

1994年上海一批中青年學人在《讀書》雜誌上討論人文精神，很能說明轉型期中中國問題的複雜性，以及對問題的觀察與診斷的歧異。

據我所知，討論最初的發起者是有感於六四之後學術文化局面的凋零，與80年代「文化熱」的巨大落差而發議論，力圖對1949年以來的文化專制作一回溯與總結。與此同時，許多上海文化人以其對時局的敏感，預見到商品文化、大眾文化、拜金心理將對他們理解和尊崇的人文精神的威脅和衝擊。無可諱言，這場討論也包含知識份子對自身地位下降和邊緣化的困惑與不滿的宣泄。

他們的基本判斷是正確的，人文精神的失落不是起於90年代初的商品經濟潮，而是發端於1949年的文化專制。他們這樣質問：「如果說人文精神的喪失是由於90年代初的商品經濟，那麼在此之前我們就很有人文精神了？」把人文精神喪失的原因，歸結為文化專制對知識份子的摧殘和他們精神的侏儒化。但是，對文化專制的追究很快銷聲匿迹，對商品經濟的聲討虛火上升。一位發言者在逃避現實性的路上走得更遠，當他被正面問到「人文精神究竟是何時喪失的」時，給出的回答竟然是「自明末清初就開始喪失了」。而新左派的代表人物還嫌沒有把原因推得更遙遠渺茫處，有人把人文精神失落問題的討論歸結為是對當代資本主義系統危機的本能反抗，認為其缺點是「沒有真正解釋市場主義時代的內在矛盾」^⑥。看來，文化大革命革中國文化的命還不夠，歷次運動打擊知識份子還不夠，幾十年的摧殘、奴化也不是原因，應該負責的是美國的大公司。

如何評價商品文化和大眾文化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但不論如何，意識到（哪怕是誇大地、偏頗地）可能有一種新的壓迫形式產生，意識到隨着社會轉型會出現新問題，就是有意義的。如果能進一步探究舊體制如何利用、結合新的經濟、社會、文化形態繼續運作（舊體制當然善於、也確實在作這種利用和結合），則更有意義。在這種意義上說，我們可以質疑人文精神討論的一些人是太不敏感和局限於舊經驗，而覺察不到新問題正在或將要出現，不能理解轉型期的問題不是單一的。

(丙) 關於自由主義和新左派之爭

從90年代中期起到現在，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爭論構成當代中國如何建構新型政治文化方面的分歧和對立的主要內容。自由主義被重新提出，不過是把自五四到80年代的新文化運動中反專制、要人權，提倡科學、自由、民主的內容深化、純化和學理化，並明確肯定以前未能強調的個人自由、法治、市場經濟和個人財產權。

不同的人 and 群體對自由主義有不同的理解，對其內容有不同的強調和取捨，對古典的和當代的自由主義流派、學說各有偏愛，對當前中國的問題有不同看法，在評價自由主義的政治文化內涵和社會作用時，只能取其基本主張。

人文精神的失落不是起始於90年代初的商品經濟潮，而是發端於1949年的文化專制。但是，對文化專制的追究很快銷聲匿迹，對商品經濟的聲討虛火上升。有人竟然說人文精神自明末清初就開始喪失了。而新左派的代表人物把人文精神失落的原因推得更遙遠，似乎應該負責的是美國的大公司。

事實上，中國當代的現實問題是如此複雜，我們不可能簡單幼稚到只在某家某派的理論中討藥方。但是，中國新舊形式專制的毒害是如此深廣，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與人類既有的文明是如此隔膜，我們不能不重申關於人的價值和制度安排的基本原則。

「新左派」這一稱呼在90年代中期一場有關國情的思想爭論中即已出現，現在，這批人中不少人拒絕這一稱謂，認為是誣稱（有人還想沾對立派的光，稱自己為「自由左派」；有人扮兩副面孔，在國內拒絕，但欣然接受西方新左派雜誌給予的「新左派」稱號）。基於以下三項理由，我認為「新左派」這個稱呼是恰當的。一、他們的思想理論資源完全來自當代西方新左派，並和他們有聯合行動；二、他們和中國老左派一樣，只反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反專制主義；三、與老左派一樣，他們肯定毛澤東的左傾做法，如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等，號稱要「繼承社會主義遺產」。

兩派的分歧，說到底是堅持反對專制主義、極權主義，還是反對資本主義的問題。其他許多問題都由此派生，比如社會不公、腐敗等等，主要是由於舊體制、由於權力的壟斷和專斷引起，還是由於新因素，即市場經濟和資本的存在引起。其實問題並不難回答，比如誰都知道，中國最嚴重、最普遍的不公正是城鄉差別，佔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從未享受到國民待遇，這難道是資本造成的不公？市場經濟是導致、加劇了這種不公正，還是起到了消解這種不公正的作用？實行市場經濟20年來，尤其是最近十來年，中國社會的轉型一直進行着，但是，中國已經變成了資本主義社會，還是仍然是一黨制國家？中國的前途是實行憲政民主，還是要借助分析全球資本主義危機（是否真的存在這種危機？）找到救治的答案？兩派的回答截然相反。

我認為，中國在政治文化方面的缺課非補不可，對毛式「社會主義遺產」非批判不可。如果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爭還有意義，那也只能是在這之後。政治自由的問題不解決，一切理論探索和爭論都像是戴着镣铐跳舞，只不過有的舞者極力想解脫镣铐，有的舞者則覺得扭曲着肢體狂歡很榮耀。

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分歧，說到底是堅持反對專制主義、極權主義，還是反對資本主義的問題。中國已經變成了資本主義社會，還是仍然是一黨制國家？中國的前途是實行憲政民主，還是要借助分析全球資本主義危機找到救治的答案？兩派的回答截然相反。

註釋

①②③⑥⑦⑧ 汪暉：〈一九八九社會運動與「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再論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台北），第四十二期（2001年6月），頁19；18；14-15；29；29-34；41。

④ 張頤武：〈闡釋「中國」的焦慮〉，《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5年4月號，頁132。

⑤ 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天涯》，1997年第5期，頁133-50。

徐友漁 現為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奧洛夫·帕爾梅客座教授。